

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研究

■ 周晓春 侯欣 王渭巍

(中央团校 社会工作系,北京 100089)

【摘要】流动儿童人数众多且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大量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在心理层面上存在诸多不足,抗逆力对流动儿童有重要影响。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引入生态资产概念,对北京市499位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生态资产因素和流动儿童抗逆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其中“家长支持”“老师关系”和“寻求心理亲近”可以显著地预测抗逆力。应该在政策层面重视建设流动儿童的生态资产,在社区层面营造关爱儿童的社区氛围,在学校层面提升教师对流动儿童的关爱和支持,在家庭层面注重亲职教育,提升家长对子女的社会支持。生态系统整合发力,提升抗逆力,促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

【关键词】流动儿童 抗逆力 生态资产 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工作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2.001

一、研究背景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卫健委报告指出,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44亿,未来二十年,我国人口迁移将继续活跃,而且呈现出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持续增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快速提高的特征^[1]。这意味着,随着父母在城市居住的流动儿童数量在增多。根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流动儿童规模已达到3851万^[2]。这些跟随城市忙碌的父母,难以享受城市较为丰富的公共服务的儿童能否健康成长,成为不同领域学者关心的问题。研究流动儿童,除了研究其教育状况、卫生健康状况、城市融入状况之外,也逐渐深化到研究流动儿童的发展状况和影响因素^[3]。而对处于不利成长环境中的流动儿童的抗逆力研究,正是对流动儿童研究逐渐深化的表现。

(一) 流动儿童的抗逆力

与传统的用缺陷视角研究流动儿童不同,国内近期出现了一批以积极视角探讨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研究。抗逆力(Resilience)是个人所具备的某类当处在危机或压力情境时能让人发展出健康应对策略^[4]的特质或能力,又被翻译为复原力、心理弹性、恢复力和心理韧性等,在流动儿

收稿日期:2019-12-10

作者简介:周晓春,中央团校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

侯欣,中央团校社会工作系副主任,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

王渭巍,中央团校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留学归国人才科研支持计划项目“北京市流动儿童开展成长向导服务研究”(课题编号:182020358)、民政部项目“北京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状况”(课题编号:5022208)的部分研究成果。

童研究领域亦沿用这种翻译。本研究采用抗逆力这一术语,并把所引文献术语统一为抗逆力。在国内抗逆力研究中,除了大量介绍性的文章和讨论如何在具体领域应用抗逆力作为分析框架之外,目前在流动儿童领域的抗逆力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流动儿童的抗逆力及其作用,二是研究影响抗逆力的影响因素,三是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途径。

抗逆力对流动儿童的影响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检验,对流动儿童的影响涵盖行为、心理特质和城市适应等方面。抗逆力既能提升流动儿童的正面行为,又能降低其负面行为。李会丽和陈琦通过调查发现,抗逆力的增强有助于亲社会行为的提高^[5],抗逆力可以通过中介效应降低不良行为^[6]。流动儿童抗逆力还和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心理特质有关。林章良等通过对500名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抗逆力与幸福感高度相关^[7]。王中会通过调查685名流动儿童发现,流动儿童的抗逆力能够预测抑郁和孤独感^[8];叶枝等人的追踪研究也发现,抗逆力既能显著地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又可以预测其孤独感随时间下降的速率^[9]。此外,抗逆力还被发现和流动儿童的认知有关,席居哲和左志宏的研究发现,抗逆力影响儿童对人际关系的认知,高抗逆力的儿童对人际关系认知更为准确和积极。宋潮对石河子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抗逆力和学业压力显著相关,并且在社会支持对学业压力的回归中起到中介作用^[10]。抗逆力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也有积极影响,王中会和蔺秀云发现,抗逆力能够对城市适应有积极影响^[11]。

虽然流动儿童的抗逆力对流动儿童成长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流动儿童的抗逆力状态并不乐观。周文娇等通过对四川农村1391名学生的研究对比发现,流动儿童的抗逆力得分显著低于本地儿童和留守儿童^[12]。韩秋念、廖全明也有类似发现^[13]。学者何玲对北京383名流动儿童的调查也发现,其抗逆力总体水平仅为中等^[14]。靳小怡、刘红升在深圳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抗逆力的总体水平不高,各维度发展水平不一,并显著低于城市儿童^[15]。

抗逆力对流动儿童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流动儿童的抗逆力状态又不尽如人意。那么,影响流动儿童的抗逆力因素有哪些呢?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一些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心理特质会影响他们的抗逆力,这些因素包括正性情绪^[16]、社会智力、移情、社会焦虑^[17]以及自尊和自我效能感^[18]。

家庭因素也会对流动儿童的抗逆力产生影响。毛向军和王中会发现依恋关系和抗逆力有关,对抗逆力有较好预测功能^[19]。彭阳等通过对406名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家庭关怀、正性情绪等因素对抗逆力有所影响,家庭关怀能够正向预测抗逆力^[20]。靳小怡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可以预测流动儿童的抗逆力,还检验了学校因素、同学支持因素等环境因素对抗逆力的影响^[21]。

其他研究较为集中地检验了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抗逆力的影响。对河南686名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社会支持能够通过提升自尊进而提升抗逆力^[22]。韩秋念和廖全明的研究发现,抗逆力的影响因素既有自身心理特质因素,也有社会因素,社会支持和抗逆力呈正相关,且父亲支持可以预测抗逆力^[23]。何玲对北京383名流动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在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等个人因素之外,社会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抗逆力的因素^[24]。流动儿童心理特质和社会因素共同预测了抗逆力。这些研究都尝试着把独立于流动儿童个体之外的生态因素纳入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的因素之中。

和研究抗逆力状况、作用及影响抗逆力的因素的研究相比,干预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研究较少。夏斌等总结了不同的干预策略^[25],张坤也回顾了不同因素干预对抗逆力的影响^[26]。在实际服务领域,张丽敏等采用实验设计,检验了对北京某区四年级流动儿童开展团体干预活动的效果,发现团体干预有利于提升流动儿童的抗逆力^[27]。这一发现和徐敏2013年对普通青少年

采用团队辅导方式干预抗逆力的发现相吻合^[28]。

此外,彭华民总结其团队实务经验,提出采用资产聚焦的策略提升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涉及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系统和以上几个系统的互动,提出通过帮助流动儿童建立关系技巧,提升流动儿童的同辈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扩充儿童社区参与的途径等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29],倡导建立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低收入儿童整合保护机制^[30]。

相应的,对其他类似群体的抗逆力的研究也发现,引入社会层面可以解释抗逆力,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不同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抗逆力有显著影响。李永鑫等人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留守儿童抗逆力呈显著的正相关^[31]。陈友庆、张瑞在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发现父母支持、学校支持及亲戚支持与抗逆力呈显著正相关,和父母联系频率高的学生抗逆力更高^[32]。还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生态系统也会影响青少年抗逆力。韩丽丽通过对1175名在校青少年的定量研究,发现学校服务是影响青少年抗逆力的重要保护因素,因而建议通过提高学校服务质量来提升青少年抗逆力^[33]。李燕平和杜曦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对留守儿童抗逆力起作用的有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情景。并提议在外部因素方面更好地进行干预^[34]。

综上,目前国内对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研究较为丰富,其中,对流动儿童抗逆力的作用问题讨论得较为充分,而对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的因素研究还有待加强;对影响因素中个体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对超出个人层面的生态系统中的因素对儿童抗逆力影响的研究不足。这种研究不足和不同干预研究中倡导使用生态系统视角来进行提升流动儿童的抗逆力的研究形成对比,需要进一步检验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因素对其抗逆力的影响。

(二) 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资产

以上讨论社会支持角度和其他超出个人自身层面的角度对抗逆力的影响的研究,和由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的框架一致。这一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个体与系统有交互作用,系统影响着个体发展,个体也能促使系统变化^[35]。国内学者已经开始采用生态系统理论来研究流动儿童,试图通过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环境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养育环境^[36]等生态系统来了解流动儿童^[37],或者探索流动儿童生态系统对流动儿童的某一心理特质的影响^[38];还有学者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建议在政府、学校、家庭和社区等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制定政策^[39],并强调邻里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生态系统因素对流动儿童成长的重要作用^[40];吴帆等尝试使用抗逆力的框架,建议从政策、学校和家庭等不同层次着手,提升流动儿童的保护性因素,降低其风险性因素^[41]。

青少年正向发展(PYD)是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青年发展范式,和传统的治疗范式、缺陷视角看待青少年不同,该理论采用把青少年看作社会值得投资和培养的宝贵资源的视角,倡导更为积极地看待青年。该理论认为,所有的青少年都需要给予发展性的资产才可能获得积极的发展^[42],发展性资产可以分为个人资产和生态资产两类。西奥卡斯(Theokas)等人对生态资产的概念进行讨论,认为青少年发展所需的发展性资产包括:(1)个人资产,其具体内容包括参与活动、人际价值观念、个人价值观念、学校投入、避免风险、社会良知等个人层面的特质。(2)生态资产,这类发展性资产存在于个人的生态系统之中,其形式包括家长投入、情景的安全、成年人作为成长向导^①、家庭联系、学校联系和社区联系等资产,个人资产和生态资产都能很好地预测

^① Mentoring, 向导服务,特指由受过训练的志愿者对青少年开展的一对一的长期陪伴服务。

青年健康发展^[43]。

不同的经验研究检验了生态资产对青少年心理指标、学业和行为等方面的健康发展的影响。厄班(Urban)等人的研究把集体活动、人力资源、物质条件和资源可得性看作邻里资产,和家庭因素、个人因素一起视为青少年发展的重要生态。邻里生态资产可以中介青少年的活动参与和青少年的危险性行为和抑郁等的关系^[44]。泰勒(Taylor)等人对五六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学校气氛、朋辈支持、家长投入和亲子关系等生态资产,和个人未来取向、教育期待、自我管理和能力等个人资产都可以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45]。泰勒等对非洲的青少年帮派成员开展多时点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个人资产和(社区)生态资产都能够影响青少年的发展指标和学业成绩^[46]。

生态系统和生态资产的视角是对处境不利的儿童开展研究的有效框架,流动儿童的社区、学校、家庭和朋辈等生态系统和其他儿童相比,都有其特殊性。关于生态系统对流动儿童影响的研究,国内目前还处于理论分析的阶段,使用生态资产框架分析流动儿童成长的研究更为缺乏。国内已有研究检验了“闲散”青少年的生态资产对其抗逆力的预测效应^[47],然而,城市“闲散”青少年和流动儿童相比,其生态系统差异较大,因而其作用于抗逆力的机制也未必相同,有必要开展流动儿童的生态资产对其抗逆力影响的研究。

综上,流动儿童群体规模庞大,其发展处于不利境地,需要进行研究和干预。在诸多的心理因素中,抗逆力对身处不利处境的流动儿童尤为重要,然而其抗逆力水平并不乐观。为了提升其抗逆力,需要对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的因素进行实证的检验,目前以生态系统视角对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研究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流动儿童不同类型的生态资产和抗逆力状况如何?不同类型的生态资产如何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与抽样

本文调查数据来自2014年民政部委托的“北京市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状况研究”课题,研究对象来自北京市H区和C区不同居委会、年龄在5-15岁之间的处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流动儿童。本次调查采取便利抽样和配额抽样的方法,选取上述行政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聚居社区、L社区、X社区和S社区等社区及其周边社区。根据北京市流动儿童在京年龄结构,确定三个社区各年龄段的人数。然后根据人数,由访问员寻找合乎条件的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9.4岁($SD=2.35$),男性占55.8%,女性占44.2%;大部分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于小学的人数高于就读初中人数(由于不能在京参加高考,流动儿童倾向于返乡接受中学教育);独生子女占28.1%,在北京出生的占43.3%。

(二) 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抗逆力。测量工具为简化版抗逆力量表(Resilience Scale)^[48]。此量表共15个条目,每项得分从1-7,得分越高,代表抗逆力越强。发现所有15个条目的信度较高($Cronbach's \alpha=0.841$)。

自变量为流动儿童的生态资产,主要从生态因素中微观系统的家庭子系统、朋辈子系统、学校子系统和社区子系统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第一,家庭子系统方面,主要从父母支持、亲子关系两方面进行测量。父母支持的测量选自Zimet等人的多维知觉社会支持量表^[49]。该量表采用七级李克特式计分,得分越高,代表流动儿童主观感受的社会支持越高。根据支持来源分为家庭支持和培养支持,本文选取和家庭有

关系量表来测量^[50],该量表采用李克特式四级计分,得分越高则亲子关系越好。该量表分为亲子关系质量和寻求心理亲近两个分量表,都有不错的信度(Cronbach's α 分别为0.87、0.613)。

第二,朋辈子系统主要测量流动儿童的朋友数量和朋辈社会支持,朋辈社会支持来自多维知觉社会支持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Cronbach's α 为0.852)。

第三,社区子系统主要测量流动儿童对所在社区的社区气氛的主观评价,测量所用指标改编自Liang等人开发的关系健康量表中的社区部分^[51],该量表为五级评分的李克特量表,得分越高则对社区评价越高,测量在本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信度(Cronbach's α =0.703)。

第四,学校子系统主要包括“同学关系”和“老师关系”两个分量表,采用自编五级评分李克特量表,得分越高,代表对同学关系、老师关系的评价越好,量表具有不错的信度,Cronbach's α 分别是0.634和0.641。

(三) 数据收集、处理与分析

本调查采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先由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作为访员,通过联系流动儿童的途径联系家长,得到对方同意以后,两位访员一组,在研究对象的家庭同时对流动儿童及其家长根据调查问卷开展结构式访问。研究人员先整理和审核通过的回收问卷,然后用SPSS软件直接录入,生成数据库,然后进行数据整理。本研究主要进行描述统计、均值比较、相关分析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

三、研究发现

统计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的抗逆力较低,且存在着个体差异。流动儿童抗逆力均值为3.25,显著低于同批调查中的本地儿童($M=3.54$, $SD=0.34$, $T=-8.813$, $df=512$, $p<0.05$)^①。就读于本地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显著高于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T=3.072$, $df=315$, $p<0.05$),女生的抗逆力显著高于男生($T=-2.319$, $df=320$, $p<0.05$)。

相关分析发现,所有的生态资产因素都和抗逆力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强的是家庭支持($r=0.416$, $p<0.05$);在学校层面,老师关系($r=0.395$, $P<0.01$)和同学关系($r=0.387$, $P<0.01$)的相关较强;在朋辈方面,朋友支持和抗逆力也呈较高的正相关($r=0.328$, $P<0.01$);在家庭层面,家庭支持的相关最高($r=0.416$, $P<0.01$),其次是寻求心理亲近($r=0.221$, $P<0.01$),再次是情感质量($r=0.197$, $P<0.01$);社区氛围也和抗逆力有较大的相关关系($r=0.241$, $P<0.01$)。

把所有生态系统因素和性别、年龄和学校类型等控制变量列入回归模型,通过逐步回归法比较不同回归模型的预测能力,最后家庭生态中的“家长支持”和“寻求心理亲近”变量、学校生态中的“教师关系”变量保留在方程中。方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调整后 R^2 为0.210($F=25.142$, $P<0.05$)。也即在控制了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以后,生态资产可以较好地预测流动儿童的抗逆力(见下页表1)。

本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首先,和现有的文献相一致,本研究发现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偏低,就读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抗逆力水平较高。流动儿童本身已处于发展上的弱势,较低的抗逆力更加剧了不利的成长环境对其健康成长的影响。其次,和生态系统的理论相一致,本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所有的生态资产因素都和其抗逆力有显著的相关,从

① 同一研究项目包括对299个本地儿童家庭的调查。

而首次把生态系统中不同层次生态系统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关系在具体的变量层次上进行了验证。最后,通过分层多元回归模型,本研究检验了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因素可以预测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来自学校生态系统和家庭生态系统的变量“家长支持”、“老师关系”、“寻求心理亲近”可以显著地预测抗逆力。这一发现,既有对生态系统理论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具体作用路径进行检验的理论意义,又有对流动儿童提供社会服务的实践意义。流动儿童是诸如留守儿童、受贫困影响的儿童等不同的处于发展的不利情景的儿童、青少年的一部分。抗逆力也是诸多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因而,对流动儿童的生态资产及其抗逆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影响处于弱势的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研究及服务提供参考。

表1 模型汇总表

序号	自变量	调整后 R ²	估计标准误
1	老师关系	0.146	0.384
2	老师关系 家庭支持	0.205	0.370
3	老师关系 家庭支持 寻求心理亲近	0.219	0.367

注:具体考察标准化回归系数,发现入选的三个生态资产变量中,其对抗逆力的影响按照回归系数的大小排序为“家长支持”、“老师关系”、“寻求心理亲近”。通过和 VIF(方差膨胀因子)值和共线性容差值来诊断自变量的共线性问题,发现在优化模型中,VIF均小于10,共线性容差之均大于0.1,说明入选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2 回归系数汇总表

因变量	自变量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常数	1.767	0.187	
抗逆力	老师关系	0.132	0.033	0.248***
	家庭支持	0.209	0.046	0.271***
	寻求心理亲近	0.091	0.039	0.131*

注:***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

四、讨论与建议

(一) 理论意义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所处的不同层级的生态系统对个人的发展有影响。这一理论在社会工作等有关青少年发展的领域被广泛接受。然而,目前国内的研究较少开展跨越某一层级生态系统的、具体的生态因素,如何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影响开展经验研究。本研究验证了流动儿童的生态资产和其抗逆力之间的关系,初步在流动儿童的生态资产和个人积极心理特质之间建立起链接。这一研究发现对抗逆力研究和流动儿童研究都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有部分关于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研究,已尝试从超出个体层面的因素来检验抗逆力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更有包容性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经验研究资料的统计分析得出积极的结论,强化了对流动儿童发展领域和抗逆力研究领域的实证基础。本文的研究发现和西奥卡斯等人的生态资产理论框架相一致^[52]。在本研究中,与抗逆力有显著正相关的生态因素分别属于他们提出的“家庭联系”、“社区联系”、“家长投入”等生态情景因素。和对“闲散”青少年开展的研究对比发现:总体较为一致,生态资产都可以有效预测抗逆力,但是与具体的入选预测模型的生态

资产不同^[53]。“闲散”青少年的“家长支持”“朋友支持”“社区氛围”和“社区安全”都对其抗逆力具有预测效果,但是,因为其已经脱离教育系统,学校生态系统的作用并未得到检验。而相对本地户籍的“闲散”青少年来说,流动儿童的社区氛围因素虽然也和抗逆力有正相关,但是并未进入最优的回归模型,这可能是由于流动儿童所处的社区较为松散,对儿童影响不足。

生态系统视角是社会工作专业重要的理论之一,不同的学者都提出应该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提高流动儿童抗逆力,本研究对生态资产对抗逆力的预测效果的检验,使得生态系统视角更为具体化,也可以给社会工作干预提供较为具体的干预策略。此外,本研究在国内首次用生态资产的概念将流动儿童在不同层级生态系统中的有利因素加以统一,深化了对生态系统因素影响流动儿童发展机制的理解。

(二) 实践意义

目前对流动儿童开展的服务,较多从流动儿童自身或者其家长入手。本研究将不同系统的发展性资产的引入,意味着我们对流动儿童开展提升抗逆力干预,应该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在社区和学校以及家庭等不同的生态系统发力,提升其发展性资产,促进青少年积极心理特质的提高,在相对较差的成长环境中健康成长。结合不同层面的生态资产,将开展讨论并提出以下社会工作干预的建议。

社区生态系统的发展性资产对儿童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主要用流动儿童对社区氛围的主观评价来测量社区生态资产,该变量和抗逆力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虽然未能保留在回归模型中,该结果依然为倡导在社区层面开展针对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的干预提供支持。流动儿童生活的社区往往是较为混乱的城乡结合部,其邻里关系和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并不容易。提示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重视社区层面的干预,提升流动人口聚居社区的社区氛围,从而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学校是流动儿童成长的重要生态子系统。本研究中,流动儿童在学校的同学关系以及和老师的关系都和抗逆力有显著正相关,老师关系变量还保留在最优模型中。而且本研究还发现,处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抗逆力高于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这些都凸显了学校对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推动家庭和学校尤其是和老师加强联系,提升学校以及老师对流动儿童的支持,促进流动儿童抗逆力的提高。朋辈生态系统和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有关,朋友数量和流动儿童从朋友处得来的社会支持都和抗逆力有显著正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朋辈对青少年的影响逐渐增强。因而,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服务为儿童提供更多的和同伴一起开展活动的机会,提升流动儿童互相之间的社会支持,促进其健康成长。家庭子系统是流动儿童社会化成长的起点,本研究中家庭资产主要包括亲子关系(两个子维度),和家长对儿童的社会支持。三者都和抗逆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家长对青少年的支持以及儿童对家长心理亲近的追求两个因素可以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抗逆力。现有文献表明,在恢复力的发展过程中,家庭因素的作用出现得早,作用更直接,影响力也比较长远^[54]。因而,社工可以通过提升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参与意识和对子女的正向支持、鼓励的意识,提升他们对流动儿童提供支持的能力,进而提升流动儿童的抗逆力。

(三) 政策建议

生态系统理论把社会政策本身看作是可以影响个人发展的宏观系统,在直接服务之外,社会政策也是促进弱势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领域。结合已有发现,本研究在政策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建议从政策层面出发,向处于弱势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多层次的、系统的社会服务。现有的社会政策通常支持社会组织向(流动)儿童和青少年自身及其家长提供服务。单一的社会服务往往难以覆盖这些不同层面的生态系统。由于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受到多个层面

的生态资产的影响 社会服务的输出应该覆盖他们的不同的生态系统。例如 在政策层面 在弱势儿童和青少年较多的社区、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 进行社区氛围提升、学校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改善的系统调整。同时 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服务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 包括教育、民政和健康保障、共青团等 不同的部门在向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也应该做好衔接工作 系统地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其次 建议从积极的发展性视角出发 为处于弱势的儿童和青少年培育促进其健康成长的生态性资产。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需要发展性资产 这些资产蕴含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态系统之中。应该在政策层次 推动采纳通过培育他们的生态资产来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的策略。现有针对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服务 通常重视补救性以及预防性质的需要 而对通常显得不那么急迫的发展性服务投入不足。要想系统地推动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积极发展 制定积极的儿童和青少年发展政策非常重要。这些政策实践可以包括设定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目标、制订有助于在各层生态系统培育儿童和青少年生态资产的具体政策、倡导发展性的服务(如成长向导服务)等。

由于资源所限 以及流动儿童居住和生活实际情况的原因 本研究未能采用严格的随机抽样。后续应该深化研究生态资产对处于弱势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各种积极发展指标的影响 包括开展质性研究 以及集合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干预研究 进一步探讨生态资产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的过程机制 从而制定更为有效的促进弱势儿童、青少年成长社会政策。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 <http://www.nhc.gov.cn/wjw/xwdt/201812/a32a43b225a740c4bf8f2168b0e9688.shtml>
- [2] 全国妇联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510/c70731-21442573.html
- [3] 周 皓 荣 珊 《我国流动儿童研究综述》,载《人口与经济》,2011 年第 3 期。
- [4] 田国秀 李宏鹤 《中学生抗逆力表现的过渡层次及其分析——基于问卷与访谈的混合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 年第 6 期。
- [5] 李会丽 陈 琦 《农村流动儿童心理弹性与亲社会倾向关系的研究》,载《校园心理》,2016 年第 1 期。
- [6] 朱 倩 郭海英 等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问题行为——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 年第 3 期。
- [7] 林良章 朱添荣 等 《流动儿童心理弹性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载《安康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 [8] 王中会 Jin G. 等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对其抑郁、孤独的影响》,载《中国特殊教育》,2014 年第 4 期。
- [9] 叶 枝 柴晓运 等 《流动性、教育安置方式和心理弹性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影响:一项追踪研究》,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 年第 5 期。
- [10] 宋 潮 王建平 《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与学业压力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载《心理学探新》,2017 年第 6 期。
- [11] 王中会 蔺秀云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及其对城市适应的影响》,载《中国特殊教育》,2012 年第 12 期。
- [12] 周文娇 高文斌 等 《四川省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心理复原力特征》,载《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 年第 3 期。
- [13] [17] [23] 韩秋念 廖全明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及其心理社会影响因素研究》,载《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2 期。
- [14] [18] [24] 何 玲 《流动儿童的抗逆力与自尊、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 [15] [21] [22] 靳小怡 刘红升 《农民工教养方式与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特征和关系》,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 [16] [20] 彭 阳 王振东 等 《流动儿童家庭关怀、正性情绪对心理韧性的影响》,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 年第 4 期。
- [19] 毛向军 王中会 《流动儿童亲子依恋及其对心理韧性的影响》,载《中国特殊教育》,2013 年第 3 期。
- [22] 李孟泽 王小新 《流动儿童自尊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载《中国学校卫生》,2013 年第 8 期。
- [25] 夏 斌 傅 纳 《儿童、青少年复原力干预研究述评》,载《教育科学研究》,2013 年第 11 期。
- [26] 张 坤 《我国儿童心理弹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 [27]张丽敏 田 浩《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团体辅导干预研究》,载《中国特殊教育》,2014年第10期。
- [28]徐 敏《团体辅导对青少年复原力的作用》,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年第9期。
- [29]彭华民 刘玉兰《抗逆力:一项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的实证研究》,载《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 [30]刘玉兰 彭华民《儿童抗逆力:一项关于流动儿童社会工作实务的探讨》,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 [31]李永鑫 骆鹏程等《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 [32]陈友庆 张 瑞《留守初中生的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的关系》,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年第9期。
- [33]韩丽丽《青少年抗逆力与学校服务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对北京市1175名青少年的问卷调查》,载《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 [34][54]李燕平 杜 曦《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研究——以曾留守大学生的生命史为视角》,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 [35]Urie Bronfenbrenner, and P. A. Morris.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6-45.
- [36]张 曼《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中的应用》,载《社会福利(理论版)》,2013年第8期。
- [37]张秀琴《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及人格特征研究》,载《现代教育科学》,2014年第2期。
- [38]李晓巍 刘 艳等《不同类型农村儿童家庭生态系统的状况及其对儿童自尊的影响》,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2期。
- [39]张 翔《流动儿童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的现状与对策——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 [40]郁 菁 黄晓燕《论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流动儿童社区保护》,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 [41]吴 帆 杨伟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基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分析》,载《人口研究》,2011年第6期。
- [42]Leffert N, Benson P L, Scales P C, et al. Developmental Assets: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on of Risk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1998, (5).
- [43][52]Theokas, C., Almerigi, J. B., Lerner, R. M., Dowling, E. M., Benson, P. L., & Scales, P. C. Conceptualizing and modeling individual and ecological asset components of thriving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05 (1).
- [44]Urban, J. B., Lewin-Bizan, S., & Lerner, R. M. The role of neighborhood ecological assets and activity involvement in youth developmental outcomes: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asset poor and asset rich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9 (5).
- [45]Taylor, C. S., Smith, P. R., Taylor, V. A., Von Eye, A., Lerner, R. M., & Balsano, A. B., et al. Individual and ecological assets and thriving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 male gang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members: a report from wave 3 of the "Overcoming the Odds" Study.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05 (1).
- [46]Taylor, Lerner, R., Eye, A., Balsano, A. B., Dowling, E. M., & Anderson, P. M., et al. Individual and ecological assets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mong gang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youth.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02 (95).
- [47][53]周晓春《社会生态资产与城市“闲散”青少年抗逆力》,载《青年研究》,2017年第3期。
- [48]Wagnild, G. M., & Young, H. M.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resilience scale. Journal of Nursing Measurement, 1993 (2).
- [49]Gregory D. Zimet, Nancy W. Dahlem, Sara G. Zimet, & Gordon K. Farley.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8 (1).
- [50]Lynch, M., & Cicchetti, D.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in maltreated and nonmaltreated children: connections amo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al models. Development & Psychopathology, 1991 (2).
- [51]Liang, B., Tracy, A. J., Kenny, M. E., Brogan, D., & Gatha, R. The relational health indices for youth: an examin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pects. Measurement &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2010 (4).

(责任编辑:王俊华)